Globethics Repository




# The Translation of Christian Classics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nd Its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Chines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QU, Xutong |
| Publisher | Nordic Forum of Sino- Western Studies, Helsinki |
| Rights |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
| Download date | 2026-11-09 16:21:48 |
| Link to Item |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699 |

# 中国基督教会的经典翻译与文化担当：

## 一些初步的观察与思考[1]

瞿旭彤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及社会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100875 北京）

**提要：**自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其文化意义而言，这句名言也指出，自佛教入华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着又一次转型或更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如何应对随着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文明与文化的冲撞与挑战。在这样的大变局中，中国基督教会不应忘记自己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使命，应该从自身基督教的角度和立场出发为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更新提出一种新生的可能性。在回顾以往经典翻译努力的基础上，本论文试图结合日本经典翻译和佛教经典汉译的经验，从经典翻译的角度谈一谈中国基督教会的文化担当，并且提出译场型和研究型翻译的具体操作方式，以便进一步推进和深入基督教经典的翻译。

**关键词：**中国基督教会、经典翻译、文化担当

**作者：**瞿旭彤，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海淀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中国，100875。电话：+86-150-1048-2882。电子邮件：thomasquxutong@ yahoo. com

## 前言

众所周知，自晚清以来，中国[2]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就其文化意义而言，这句名言不仅仅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向近现代文化与社会的转型困境，[3]而且也指出了中国文化自佛教入华以来所面临的又一次转型、甚或更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如何应对随着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文明与文化的冲撞与挑战。[4]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仍然处

〔1〕 本文系作者 2014 年 6 月-8 月在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期间的研究成果，曾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宣读于由香港浸会大学、建道神学院和迦密山国际学术文化论坛联合主办的“基督信仰与道德重建学术论坛”。会议期间得到多位专家学者的指正，特此致谢！

〔2〕 我们这里所理解的中国，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即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在内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对其有认同感和担当感的地区，即所谓的“文化中国”。

〔3〕 参袁伟时 Yuan Weishi，《晚清大变局》Wanqing da bianju［The Great Change in Late Qing Dynasty］，（北京 Beijing：线装书局 Xianzhuang shuju［Thread-Bound Book Company］，2014），4-31。

〔4〕 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而言，正是由于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同时性与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直至今天的不少中国人心目中，尤其在那些持有（儒家/教）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眼里，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必须予以克服的文化危机。

于这样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之中,仍然处于一种方向和未来都不清晰的发展过程之中。

要想回应和改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持守者(特别是当今的很多儒家/教人士而言)而言,我们不应走上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一味回避、甚至激烈批判基督教文化,幻想回到过去和恢复旧制,以为这样就可以在一个与过去迥乎不同的处境中开创出中国文化的新路。[5]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应该与基督教文化展开对话,为自身文化老树的重生创造可能的环境与土壤。对于中国基督教会而言,我们不应只是专注于拯救个体的灵魂,而忘记了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使命。在忠于基督福音、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态度的同时,我们应尽可能地参与(中国)文化的重整与建设,发挥基督信仰与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与更新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不一定必须是导向性的,不一定必须是将(中国)文化全盘基督教化的,而是从我们自身基督教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提出一种新生的可能性,并且做出可能的贡献。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历史的走向不是单靠某一文明或文化所能决定的,而是靠不同传统与文明之间的合力作用。上帝在不同文化或文明之中的心意,不是要每一种文化或文明都变得一模一样,而是“万物各从其类”。[6]

我们相信,基督教会在中国文化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何推动这种作用的发生,以及如何评价这种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有待于历史长河的验证。

三人行,必有吾师。在以基督教文化促进中国文化更新与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基督教经典翻译[7]的这一方面,对外而言,我们有日本(基督教会)这样一位值得借鉴的老师和邻居。对内而言,佛经汉译的经验也许不失为中国基督教会的借镜与参考。在回顾以往经典翻译努力的基础上,本报告将试图结合日本经典翻译和佛教经典汉译的经验,从经典翻译的角度谈一谈中国基督教会的文化担当。

## 以往的努力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自 19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43, 1807)入华以来

〔5〕 参石衡潭 Shi Hengtan,以儒学热为中心的国学热对基督教的挑战 Yi ruxuere wei zhongxin de guoxuere dui jidujiao de tiaozhan [The Challange of the National-Studies-Tide on Christianity],林日峰 Lin Rifeng 编著,《廿一世纪中国教会的崛起、挑战、装备与契机》Nianshiyi shiji zhongguo jiaohui de jueqi, tiaozhan, zhuangbei, yu qiji [The Rise, Challenges, Chances and Equipment and Chance of China in 21st Century],(台北 Taipei:基督教中国主日学协会 Jidujiao zhongguo zhurixue xiehui [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2014),145-174,尤参 162。

〔6〕 在这里,我们倾向于赞同许倬云不以黄河、而以长江为比喻的文化观,参许倬云 Hsu Cho-Yun,《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Wangu jianghe: zhonguo lishi wenhua de zhuanzhe yu kaizhan [The Turning and Unfolding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Shanghai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6)。

〔7〕 本文所讨论的经典翻译,指的是对《圣经》之外的基督教经典作家(比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古代神学家或思想家,尤其是宗教改革以来的重要神学家,比如,路德和加尔文)及其经典作品的翻译。

中国基督教会在经典翻译上的努力。[8]正如谢扶雅所说,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也许有必要撰写一部中国基督教会的《高僧传》,介绍和评论翻译基督教经典的"译师",为他们作传立碑,由此建立中国基督教经典翻译与诠释的传统与"道统"。[9]

根据黎子鹏的说法,在19世纪出版的基督教中文书籍当中,除了《圣经》之外,主要都是属于跨宗派的、用于传教的书刊和小册子。这些翻译作品虽然塑造了不少华人基督徒的信仰和神学概念,但往往"缺乏深度,不够多元化"。[1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基督教经典翻译还处于极为简陋的开始阶段,除了圣经翻译和部分福音小册子之外,真可谓是乏善可称。之所以如此,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基督教会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很有可能也是出于当时传教教会的策略与影响。[11]

第一次将基督教经典大规模且有系统地翻译到中国文化世界,开始于战乱频仍的上世纪40年代。[12]时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新约教授的美国神学家和汉学家章文新(Francis P. Jones, 1890-1975)与孙恩三(? -1951)、葛德基(Earl Cressy, 1883-1979)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并且与美国神学界的多位权威商定编译方案,为的是让这些译成中文的"基督教二千

---

〔8〕 关于香港新教的神学经典翻译情况,参蔡景图 Cai Jingtu,香港新教神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概况 Xianggang xinjiao shenxue shuji de fanyi he chuban gaikuang [The Overview about the Publication of Theological Literature in Hong Kong],杨熙楠、雷保德 Yeung Heenam Daniel and Paul Rabbe 编,《翻译与吸纳:大公神学和汉语神学》*Fanyi yu xina: dagong shenxue he hanyu shenxue* [Translation and Adoption: Ecumenical Theology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香港 Hong Kong:道风书社 Daofeng shushe [Logos & Pneuma Press],2004),219-242,尤参225-228。除了蔡景图同样提及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历代基督教学术思想文库》之外,"[香港]新教的翻译著作起初在选题上较为倾向圣经研究与信仰生活的类别,一九八0年代之后的神学与圣经参考书籍逐渐增多,可惜对当代神学著作的翻译在比例上仍占少数,而且大多数译自英文著(译)作"(227)。借用蔡景图的说法,这是由于"香港新教的神学翻译,一向不单出于学术研究的考虑,也取决于教会的信仰和事工的需要"。同样因为如此,"德国神学著作的中文翻译数量不多"(229-230)。根据笔者近日在2014年香港书展上的观察,就最近几年基督教神学思想著作翻译而言,绝大部分的确是译自英文著(译)作,而且已有相当多的当代神学著作翻译。只是,基督教经典作品的翻译仍是非常罕见。比如,宗教改革巨匠路德的作品,仅有几部小册子被翻成中文(应该都是译自德文版)。

关于台湾的基督教经典翻译状况,参林鸿信 Lin Hongxin,台湾基督教翻译与出版情况 Taiwan jidujiao fanyi yu chuban qingkuang [The Christian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in Taiwan],同上书,243-253。关于经典著作的翻译,林鸿信特别指出,"就神学作品而言,可以列入经典著作者,如路德、加尔文、士来马赫、巴特的中文翻译仍然极少[…]"(249)。

关于天主教的经典翻译状况,刘小枫有过如下看法:"本来,从基督教历史传承和汉语基督教历史来看,人们最有理由期待天主教方面主持系统的古典基督教学典汉译工程。台湾天主教学界虽然零星翻译了奥古斯丁、托马斯o阿奎那、波拉图文纳和某些现当代的天主教信理著作,却从来没有系统的、精心设计和组织的翻译计划——中国天主教学界的学术精力用到哪里去了?除了传介西方哲学就是'补儒'"。参刘小枫 Liu Xiaofeng,《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Hanyu shenxue yu lishi zhexue* [The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香港 Hong Kong: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2000),66-67。不过,这样的评价已经显得过时。比如,在碧岳学社的推动下,周克勤神父联合多位神哲学界精英(陈家华、高旭东、胡安德、李震、刘俊余、王守身),以拉丁文为主,以多国语言(德、法、西、意、英)为辅助,历经多年,完成托马斯阿奎那之《神学大全》(2008年)的翻译,值得钦佩。碧岳学社致力于"编印中文神哲学论著、并译介历代教父与圣师之名著"(比如,奥古斯丁),至今已有十余种译著问世,并以闻道出版社名义出版。详参官方网站 http://summatheologiae.studium-piusx.org,2014-08-09。

〔9〕 参谢扶雅 Xie Fu-ya,《章文新博士:第二鸠摩罗什》Zhangwenxin boshi: di'er jiumoluoshi [Dr. Francis P. Jones: The Second Kumārajīva],http://www.b3927.com/2010/772.html,2014-07-15。

〔10〕 黎子鹏 Lai Tsz Pang John,圣教书会与基督教在华翻译出版事业 Shengjiaoshuhui yu jiidujiao zaihua fanyi chuban shiye [Tract Society and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 China],李金强 Lee Kam Keung、吴梓明 Ng Tze Ming Peter、邢福增 Ying Fuk Tsang 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Zi xi cu dong: jidujiao laihua erbainian lunji [East Meets West: Essays Celebrating the Bicentennial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香港 Hong Kong: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Jidujiao wenyi chubanshe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2009),353-368,363和364。另参汤开建、颜小华,晚清入粤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文字出版活动 Wanqing ruyue meiguo zhanglaohui chuanjiaoshi de wenzi chuban huodong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in Guangdong in Late Qing Dynasty],同上书,369-385,尤其384。

〔11〕 总体而言,除了少数例外,这也可看作对两百年来中国基督教经典翻译的总体评价。

〔12〕 参张贤勇 Zhang Xianyong,道声风云闻神州 Daosheng fengyun wen shenzhou [The Voice of Logos in China],《翻译与吸纳:大公神学和汉语神学》,同上书,201-209,202和脚注3。

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能够“对中国基督教徒思想与信仰的发展,必将大有助益”。[13]这位被誉为“第二鸠摩罗什”的美国基督徒,与中国神学家谢扶雅(徐宝谦、许牧世、汤清、赵世泽)等人密切合作,至60年代完成32卷的翻译与出版。按照谢扶雅本人的说法,“[…]翻译基督教经典,比之翻译昔年佛经为繁复。当时汉译的佛门经典,似乎只有梵文一种。对于佛经中的许多专门名辞,如涅槃、菩提、般若等等,皆采音译。但汉译基督教历代名著,除人名地名外,对专辞尽可能译出其原义”。最令人感佩的是,这32卷译著[14]共约1500万字,字字经由章文新本人寓目校订。[15]这部集成可谓是开创了基督教经典翻译的先河。但是,“《集成》也有历史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思想学典顾及不足。最令人遗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终”。[16]

20年代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世界出现了大量关于基督教经典的翻译作品。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由刘小枫和杨熙楠等人所创始的、规模庞大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翻译项目。[17]“这项堪比千年汉译佛典的志业”[18]承继章文新等人开创的翻译先河,[19]试图达到如下三个目的:其一,“[…]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思想学典未尽之业,以补汉译泰西学术中迻译基督教思想学典之不足”。其二,“[...]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汉语思想文化传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其三,“汉语学术思想值现代转型重铸之际,文库愿益于汉语思想之丰硕,不负汉语学术之来者”。[20]主持和推进此项翻译计划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虽然具有浓厚的教会背景,但所追求的旨趣并非教会宣教性的,而是学术思想性的。与其他基督教经典翻译项目不同,该文库不以某一特定教派或宗派为依托,

---

〔13〕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 Jinlin shenxueyuan tuoshibu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Trustee],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弁言,引自:<历代基督教信条》Lidai jidujiao xintiao [Confessions of Faith],汤清 Christopher Tang 编译,(香港 Hong King: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Jidujiao wenyi chubanshe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1986年第三版,1957年初版),9-10。按照谢扶雅的说法,此项计划的动议来自齐鲁大学教务长孙恩三:“恩三是一个中英文俱优卓而又富创见的基督徒,跟许多同道一样,深觉我国在中世纪大量翻译佛经,滋益了中国文化学术,而基督教在华,却对文字传道素不重视”,参谢扶雅所撰传略《章文新博士:第二鸠摩罗什》,同上文。

〔14〕 参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书目一览,载于:比如,《历代基督教信条》,同上书,884-886。

〔15〕 参谢扶雅所撰传略《章文新博士:第二鸠摩罗什》,同上文。

〔16〕 《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总序,2004年12月,在香港出版的每部文库译作均刊有此序,此处引自文库第一本译作《论隐秘的上帝》*Lun yinmi de shangdi* [De Deo abscondito](尼古拉o库萨 Nicolai de Cusa 著,李秋零 Li Qiuling 译,香港 Hong Kong: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 Xianggang daofengshan jidujiao conglin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er],1994)。另参蔡景图,香港新教神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概况,同上书,227。

〔17〕 该文库的先声可以说是如下译文选:《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Ershi shiji xifang zongjiao zhexuewenxuan* [Selected Literature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 20th Century](刘小枫 Liu Xiaofeng 主编,1988年编定,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1991)。张贤勇也有类似看法:“刘小枫博士日后为本所主次编译《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不妨看作《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所开创事业的延伸、继续跟进和扩展”,参张贤勇,道声风云闻神州,同上书,204。

此外,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还推出《道风译丛》,迄今为止已刊行二十余本,主要是一些“短(编辑、出版周期短)、平(面目平易近人)、快(传输当前国际学术成果速度快捷)”的作品,参,《道风译从》缘起,韦尔克 Michael Welker、林子淳 Jason Lam 编,《政治与公共:中西神学对谈》*Zhengzhi yu gonggong: zhongxi shenxue duitan* [Political and Public: Western and Chinese Theological Discourse],卢冠霖 Lo Kwun-lam、杨杏文 Yeung Hang-man 译,(香港 Hong Kong:道风书社 Daofeng Shus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2014)。

〔18〕 杨熙楠 Yeung Heenam Daniel,“一个不可能的可能”Yige bu keneng de keneng [A Impossible Possibility],载于:《号外:<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贺出版超过一百部》*Haowai: Lidai jidujiao sixiang xueshu wenku he chuban chaoguo yibai bu* [Christian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has published over 100 titles],(香港 Hong Kong: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Xianggang hanyu jidujiao yanjiusuo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2008年9月)。

〔19〕 比如,《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的分类(古代系列、现代系列和研究系列)显然是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分类(古代及中世纪基督教名著、改教时期至十九世纪基督教名著、二十世纪基督教名著)为蓝本和参照的。

〔20〕 《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总序,同上书。

而是涉及历代基督宗教的各种“思想学典”,[21]“倡导以汉语思想和经验重新诠释基督教神学之传统”,试图为汉语学术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尽一份心力。[22]迄今为止,该文库译作已过百本,并且还在大陆多方出版,分别收入多种不同的译丛。[23]

与《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旨趣不同的是,基督徒学人孙毅和游冠辉等人凭着对信仰的热诚和对文化的关注,在老一辈学者何光沪的支持下,创立《基督教经典译从》(北京:三联书店),[24]着重翻译历代基督教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25]迄今至少已出二十三册。关于该译丛的旨趣与目的,也许孙毅在为加尔文《基督教教义》所撰中译本导言给我们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加尔文]“对西方

---

〔21〕 “思想学典”语出《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总序,同上书。所以,该文库也间或收纳汉语基督教思想文献,比如,《汉语景教文典诠释》*Hanyu jingjiao wendian quanshi* [Sino-Nestorian Documents: Commentary and Exegesis](翁绍军 Weng Shao Jun 注释,香港 Hong Kong: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Xianggang hanyu jidujiao yanjiusuo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1995)和《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徐光启 李之藻 杨廷筠论教文集》*Mingmo tianzhujiao sanzhushi wen jianzhu* [Catholic Documents of Xu Guangqi, Li Zhizao, Yang Ting Yuun](李天纲 Li Tian Gang 编注,香港 Hong Kong:道风书社 Daofeng shus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2007)。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周联华鼎力支持、由曾庆豹和吴昶兴主编的《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新北:橄榄出版)。在周联华看来,“本委员会[…]主编这套丛书,从景教开始直到一九五0年,以广义之基督教定义蒐集一千三百年来汉语创作凡百余本,名为《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藉以对历史负责,也以此来回馈读者”,周联华,总序,载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Jidujiao yu zhongguo wenhua*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吴雷川著作集(一),附录:耶稣的社会理想,吴雷川 Wu Lei Chuan 著,曾庆豹 Chin Ken Pa 编注,(新北 New Taipei:橄榄出版社 Oliver Press,2013),V。按照实际倡议者和操办者曾庆豹(编者序,同上,页 X-XI)的说法,该文库“一改教会出版传统以神学或教派立场为依准的做法”,根据学术专业来判断和选择何本著作可以被纳入文库之中。文库的目标“与构思基督教是否扎根于汉语世界有关”。但是,至于具体的作家和作品在什么意义上是经典,无论是周联华(“汉语创作”),还是曾庆豹,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曾庆豹等人似乎有从后现代立场建构“汉语基督教经典”的意图(因为该文库所收集的许多著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界或思想界所公认的“经典”,比如,《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选粹》*Wanqing jidujiao xushi wenxue xuecui* [Selected Christian Narrative Literature of Late-Qing China](黎子鹏 Lai Tsz Pang John 编注,2012)。按照黎子鹏的说法,本选集“收编了六部十九世纪汉语基督教叙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分为创作和翻译两大类[…]”,编者序,页 IX)和《赎罪之道传:郭实腊基督教小说集》*Shuzui zhi daozhuan: Guoshila jidujiao xiaoshuoji* [The Way of Salvation: Selected Christian Novels of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黎子鹏 Lai Tsz Pang John 编注,2013),并且试图如谢扶雅等人所提议的那样编辑一套基督教的“景藏”,一方面是比对道藏、佛藏(以及[现正在编辑的]儒藏)而进行基督教自身经典的搜集与编辑,另一方面则是跨越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界限(参编者序,IX)。不过,在[出版社的]“出版缘由”中则有如下的说法:“本出版计划主要锁定有高度价值的文献、古典的作品等,以期在社会当中推广相关书籍之阅读风气。基本上将不预设收入的书目,但以有代表性之作品先行出版,并尽量以时序来排出版顺序,其中亦不排除已出版过的作品。若有下列特色者则列为重要之出版:1、明显具有重要性;2、影响范围广大;3、罕见、重要且又未再出版之作品;4、在华人世界的基督信仰中为开创先锋者之作品;5、传教贡献大之作品;6、内容所论及之议题重要者,例如礼仪之争;7、关于各个基督宗教的礼仪崇拜和信徒生活之重要作品等”,“‘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即等于类似于“十三经”、“大藏经”、“道藏”,见证基督在汉语文化中存在的事实及贡献,为所有大学和研究单位图书馆收藏的对象,为上帝的国度攻占华人文化和学术思想界做好准备,修直主的道路,预备人心归向创造主”(经典文库粉丝团,2014-07-24)。

〔22〕 参《号外》,前引文献,另参其中所载杨熙楠文:“文库的出版旨在为中国学界提供一个研究基督教思想的文献资源,为此其主要的读者是中国学界”。

〔23〕 比如,《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刘小枫 主编,北京:三联书店);《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刘小枫 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刘小枫 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o 世纪文库》(陈昕 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基督教文化经典系列》(查常平 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甚至还有在大陆学术界仍然享有崇高声誉的《世界汉译学术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此外,在人民出版社(北京)和东方出版社(北京)等出版社也分别有零星图书出版。

〔24〕 在此之前,游冠辉和孙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基督教文化译丛》,凡十余本,为普及和传播基督教的思想与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为该译丛撰写的总序中,他们特别提到:“两年来,基督教一直在塑造着人类的文明,影响着它传到之处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碰撞和融合”。“为了满足中国学人了解和研究基督教的需要,我们推出了这套‘基督教文化译丛’。这套译丛旨在从学术的角度对基督教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介绍”。出于此目的,也“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要,译丛尽可能选择具有较强可读性、能被一般受过教育的读者所理解的著作”,游冠辉、孙毅,“基督教文化译丛”总序,阿尔文 o 施密特 Alvin Schmidt 著,《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Jidujiao dui wenming de yingxiang* [How Christianity Changed the World],汪晓丹 Wang Xiaodan、赵巍 Zhao Wei 译,苏欲晓 Su Yuxiao 校,(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2004),1-2。

〔25〕 参何光沪为此套译丛撰写的总序,约翰 o 加尔文 John Calvin 著,《基督教要义》*Jidujiao yaoyi* [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上册),约翰 o 麦克尼尔 John T. McNeil 编,福特 o 路易斯 o 巴特尔斯 Ford Lewis Battles 英译,钱曜诚 Qian Yaocheng 等 中译,孙毅 Sun Yi、游冠辉 You Guanhui 修订,(北京 Beijing: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Joint Publishing], 2010),3-5。

社会进入到现代所产生的影响不次于他对新教教会在神学建构方面的影响。[…]基督教在西方历史的两个转折点——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在中世纪的支配性地位,以及进入现代的初期加尔文主义的传声——转变或塑造了西方文化。在这些转折的时期,不是基督教被世俗化,而是基督教塑造和形成了社会文化"。[26]

除此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至少如下两部译从。其一是何光沪自上世纪80年代所主编的《宗教与世界丛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迄今为止共出版约40册。此丛书选题范围甚广,并不局限于基督教思想经典的翻译,其中包括部分基督教经典(作家或作品)。[27]该丛书的初衷是博采众家之长,在宗教人生观世界观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28]

其二是陈维正和刘小枫共同主编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从》。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国内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了解现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潮,以便纵观全局,我们选编译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丛书出版"。[29]该译丛选书精当,其中有不少基督教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30]

由于神学与哲学在西方思想史长期以来的紧密关系,大陆研究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学者或零星或有规模地翻译了部分基督教经典作家的作品,比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正在进行中,北京:商务印书馆)。

此外,还有一个翻译计划值得一提,即中文版《路德文集》翻译出版计划,为了"促进中国及海外华人界的路德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翻译委员会准备翻译和出版十五卷的路德文选,分别包括改革运动文献、信仰与社会、圣经讲章、神学与其他文选等五个主题,基本上收录了路德的主要著作,目前已出版2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实际上,"这项国际合作项目"由美国的一间信义宗教会资助,底本为英文本,参与翻译的人鲜有路德研究专家,且不论译者是否通晓德文和拉丁文。

## 日本的例子

大家可能和我们一样常常听说,日本文化界和学术界重视翻译,甚至日本学者到了不出国门、不懂外语就可以掌握世界文化与学术最新动态的地步。前段时间,笔者赴日开会,有幸拜访两间规模不大的神学院(日本信义宗神学院和东京神学大学),并且走马观花式地参观了日本信义宗神学院图书馆。短短半个小时的参观,所见已经令人叹为观止。日本信义宗神学院规模不大,却藏有多种版本的路德全集、以及大量关于路德的德文和英文研究著作,尽管该神学院由于与美国信义宗教会的历史关联,在德国受过神学训练、懂德语的人并不多。更为让人惊叹的是,在笔者所见到的该图书馆所藏日

〔26〕 孙毅 Sunyi,中译本导言,《基督教教义》(上册),同上书,页29-30。

〔27〕 比如,德国神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的《狱中书简》*Yuzhong Shujian* [Letters from Prison](高师宁 译,英文)和《作门徒的代价》Zuo mentu de daijia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安希孟 An Ximeng 译,英文);甚至还有 Paul Tillich 关于政治思考的一部选集《政治期望》*Zhengzhi Qiwang* [Political Expectation](徐钧尧 Xu Junyao 译)。

〔28〕 何光沪 He Guanghu,《宗教之解释》丛书总序(1988年),柯毅霖 Gianni Criveller 著,《晚明基督论》*Wanming jidulun* [Christology in Late-Ming],王志成 Wang Zhicheng、思竹 Sizhu、汪建达 Wang Jianda 译,(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Sichuan People Publishing House],1999),2-3。另参何光沪 He Guanghu,《宗教与世界》丛书再序,同上书,1-2。

〔29〕 编者的话。

〔30〕 比如,Max Scheler 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Ren zai yuzhou zhong de diwei* [The Position of Human Being in Cosmos]、Paul Tillich 的《存在的勇气》Cunzai de yongqi [The Courage to Be]、Soren Kierkegaard 的《恐惧与颤栗》Kongju yu zhanli [Fear and Trembling]、Reinhold Niebuhr《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Daode de ren yu budaode de shehui* [The Moral Person and the Immoral Society]。

文书目中,居然有十卷左右的路德文集、十几卷的巴特讲道集、全套的朋霍费尔文集。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基督教经典作家。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Emil Brunner 和 Rudolf Bultmann 等著名神学家的日文全集也赫然列入眼帘。这还仅仅是半个小时参观所看见的冰山一角。日本的基督教经典翻译比笔者一时所见的肯定更为广泛和深入。

## 佛教的借鉴

我们不知道,日本的翻译,尤其是日本的基督教经典翻译,是否以佛经汉译为楷模。但是,我们清楚无误地知道,无论是以章文新等人为主持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还是以刘小枫和杨熙楠等人[31]为统筹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均以佛经汉译为榜样。关于汉译佛经的具体人物和过程,汉语学界多有介绍和评述,[32]此处就不多加赘言,只是谈谈汉译佛经对中国基督教会继续从事经典翻译与担当文化使命的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迪。

假若没有绵延千百年的译经、传教、判教和立教,那么,佛教在中国的境况就会大不相同,而且很少会有人以为来自印度的佛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33]并且对之充满文化(与政治)上的信任。恰恰是由于当年的佛经翻译,佛教思想得以进入中国文化,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过,任何大的文化或文明,都不是单元的,终归是不同(质)文化的汇聚与整合。就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而言,佛教思想并没有独大地主导过中国文化,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此为鉴,基督教文化以后也不大有可能独大地主导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实现全盘的基督教化。但是,就中国文化现在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言,中国文化需要基督教文化进入她的根底处,成为其有机的一部分,成为其重整与发展的新契机和新动力。在关于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上,基督教会应该时时提醒自己,教会宣讲和见证的是上帝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论是个体灵魂的拯救,还是对整体文化的更新,并不是教会自身所能成就的,而是仰赖于上帝自己的旨意和他自己在历史与文化中的行动("愿你的国度降临")。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应当做的(无论是适应,还是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探寻和认清自己在上帝行动中的位置、使命和呼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持守好自己的本分和呼召,此外无他。由此,本方能立,上帝之道,上帝对中国文化的改造、更新甚或救赎,则顺上帝之旨意而生发和成长。在上帝旨意生发和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教会,每一个具体的基督徒,他们所感受的具体呼召和实际能做的具体事情,可能并不一样,而且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只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尽力而为即可。这是基督徒从事文化事业的最大祝福,因为他们不必在意一时的成就和结果,而是专注于实现自己在上帝国度中的呼召与本分。

## 教会的异象?

中国基督教会若要落实自己的文化使命,进入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与努力,一个确实可行的途径也许就是学习佛经汉译的历史经验,继续推进基督教经典翻译的伟业。

---

〔31〕 参杨熙楠,《号外》,前引文献:"还记得小枫兄与光沪兄一并禅式棒喝,促我好好细读汉译佛典、中国佛教的诞生和中西方跨文化三者之互动关系[…]从上而论,以史为鉴,我感悟汉语神学的出现于汉译基督教经典二者关系应是一脉相承、互为紧扣"。

〔32〕 关于佛教入华与译经的简要概述,比如,可参庄祖鲲 Tsukung Chuang,《宣教与文化》*Xuanjiao yu wenhua* [Mission and Culture],(Paradise, PA, USA:基督使者协会 Ambassadors for Christ,2004),63-100,尤其 79-80。

〔33〕 此处,我们暂且不论佛教的中国化是否已脱离了印度佛教的原型与精髓。

章文新和谢扶雅等人主持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项目来自孙恩三这位中国基督徒的感慨,[34]具体的落实则是仰赖纽约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金会)的特款(和章文新这位美国基督徒的主持)。[35]刘小枫和杨熙楠等人负责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翻译人虽然主要来自中国学术界,但是其资金来源主要并非中国基督教会,而是北欧教会的亚略巴谷基金会(the Areopagus Foundation)。[36]至于游冠辉和孙毅等基督徒学人的(个人)努力,一方面也许更具有教会的背景,另一方面想必也带着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与更新文化的使命。

在中国文化更新与转型的历史时刻,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基督教会对于所处的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异象?也许,中国基督教教会可以借鉴佛教译经的经验,制订整体规划,调配和整合各方资源,培养专门人才,使得基督教经典翻译不再是某些少数基督徒学人或者机构的异象,而是成为上帝国度在中国文化中彰显、并对之加以改造和引领的异象,成为整个教会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之一。

此外,教会若重视自己的文化使命,若能拿出部分资源和精力重视经典翻译,[37]也必将极大地提升教会自身内的神学教育与信仰培育。[38]如前所言,这也是章文新等人主持《基督教历代名著》的初衷。在中国基督教会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异端层出不穷,这不仅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强大传统、与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处境密切相关,而且也与教会长期以来专注《圣经》与福音小册子的"文字事工"、并且轻视有着丰富文化和思想内涵的神学教育有着不小的关联。[39]

## 具体的做法?

鉴于中国基督教会的具体政治社会处境,我们不可能像鸠摩罗什翻译佛经那样得到官方的扶持,也不太可能建立数千人的庞大译场。但是,我们依然有可能致力于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力图为基督教思想与文化在汉语语境的进一步展开建立坚实的基础,从而为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更新贡献一份来自基督教的力量。

为了引介基督教经典,以往的翻译计划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与辉煌的贡献。这是我们必须表示由衷敬佩与赞赏的!但是,若从专业研究与翻译的角度而言,其中不少的翻译作品离优秀的经典作品翻译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少译者既缺乏原文语言能力,又对所翻译的

---

〔34〕 另参蔡锦图 Cai Jintu,香港新教神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概况,同上书,226。

〔35〕 谢扶雅,《章文新:第二鸠摩罗什》,同上文。参刘小枫,《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同上书,页66。

〔36〕 "2006年,亚略巴谷协会[应作基金会]开始构思把道风山的管理权和资产权转交香港管理,遂计划成立'[香港]道风山基金会'接管道风山。此基金会的管理成员来自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亚略巴谷协会[应作基金会]的代表",参谭沛泉 Tam Pui Chuen Ekman、杨熙楠 Yeung Heenam Daniel、王世杰 Wong Saikit Jacob 编,《继往开来:道风山八十周年志庆》*Jiwangkailai*: *Dao Feng Shan bashi zhounian zhiqing* [Ground and Unfolding: Tao Fong Shan 80the Anniversary],(香港 Hong Kong:道风山基金会 Tao Fong Shan Foundation、道风山基督教丛林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2010),2。亚略巴谷基金会的前身即由挪威传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所创立的 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CMB),基金会网页为 http://www.areopagos.org/pages/english_side.aspx?nr=65, 2014-08-10。

〔37〕 中国基督教会拥有众多精英,却鲜有重视和致力于经典翻译者。很多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自身的神学创作之中,这可能与自古以来追求"立德、立言和立功"的儒家传统有关。

〔38〕 章文新博士去世后,《历代基督教名著集成》翻译项目中断,资金转向《东南亚神学教育丛书》。随之,翻译的选题方向发生了根本改变,即不再注重基督教经典作品的翻译,而是以神学教育的教科书为主,而且教科书的选择开始呈现出鲜明的教派性。参刘小枫 Liu Xiaofeng,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 Xiandai yujing zhong de hanyu jidu shenxue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modern context],《道风:汉语神学学刊》*Logos and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第2期,30,另参该文修订和扩充版,《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同上书,66。参潘应求 James Y. K. Pan (《基督教神学教育丛书》编译旨趣,引自:巴特 Karl Barth,《福音的神学:导论》*Fuyin de Shenxue*: *Daolun* [Evangel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龚书森 Gong Shusen 译,台南 Tainan:东南亚神学院协会台湾分会 Taiwan Section, The 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975):"本丛书编译之目的,在供给东南亚神学教授、神学生及一般信徒中文参考书、教科书、及神学与圣经研究之工具书等,藉以沟通东西神学思想、并交换各地神学研究之成果"。

〔39〕 远的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者洪秀全,近的比如东方闪电(或称全能神教)的创立者赵维山!

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缺乏专业研究,暂且不论其译作在付梓刊行前是否经历过“译场”般的多番检验。

还是以佛经翻译为例,也许,继续推进的基督教经典翻译从中可以得着一些借鉴。若想真正启动一项经典的翻译项目,相关“译场”机制的建立或许更能促成翻译的进展和果效。就目前基督教经典翻译的处境而言,相关“译场”似乎至少应包括在语言(原文语言、一般汉语和教会语言等)和专业上均有所造诣的译者,从事基督教研究(又可粗略分为系统神学、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历史神学和实践神学等)的学者和学生,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或学生,出版社的相关责任编辑,以及普通基督徒(包括教会牧师)和一般读者各一位。在此基础上,寻求建立一种结构化的、可持续发展的互动模式,即,面向所有对所翻译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感兴趣的人群,中译者应该有规律地开展专门阅读相关文本的小型读书班,参照所能阅读的不同语种/版本的文本,边阅读边翻译,边翻译边阅读,以此检验翻译的效果,并且提高翻译的质量。在译稿初步完成后的修订过程中,可考虑举行短期的密集读书班或研讨会,对译稿和相关原文文本进行研究与探讨。以此为基础,或可建立该经典作家研究者长期互动的相关机制,比如,建立与教会和学界有良好互动关系的专业协会。身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基督徒学者似乎得天独厚,有着良好的条件来建立这样的“译场”。可喜的是,如今已有不少这样的尝试初现端倪。

当然,这样以“译场”进行基督教经典翻译的具体做法,最好至少还需要如下一种翻译模式的补充,即研究型翻译。中译者最好对该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有过专门研究(最好写过相关学位论文),而且有能力、并且有意愿撰写详细的注释与串解。不仅如此,译者应该能够(或者能够找到相应专家)编写相关导言与研究书目,导言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该经典作品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主要内容、以及相关的作用史和研究史。若可能的话,导言也应涉及该经典作品在该经典作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翻译基督教经典,暂且无论是否拥有译场,还是是否做过专门研究,暂且不谈什么信、达、雅或“异化”与“归化”的翻译学争论,如前所述,首先乃是意味着,中译者必须具备基本的语言和专业能力,能凭着天生禀赋或习得能力在不同的文化、世界和语言系统之间进行“摆渡”(? bertragen)的工作。笔者曾经依据至少三本不同的英译本,翻译过基督教的第一部教会史著作:优西比乌(Eusebius)的《教会史》。笔者在翻译时深知,自己的训练与素养其实是远远不够格的,故在翻译过程中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一个相对理想的中译者应略知优西比乌同时代的希腊语、希伯来圣经七十子译本的希腊语、新约圣经希腊语等古典语言,通晓不同语种译者所使用的语言(至少是英语、德语和法语等现代语言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译者要精通翻译的目标语言:汉语。即使母语为汉语的人,包括笔者本人在内,也未必能精通书面汉语和中国教会的语言(以基督新教为例,比如,《圣经》和合中译本的用语习惯),遑论是否专门研究(过)基督教思想和相关罗马史。

我们深深知道,建立译场,做过专门研究,并且有深厚的语言修养。这样的理想要求,恐怕只有极少数译林翘楚才能加以满足。我们也深深知道,曾经和正在做出的基督教经典翻译努力都是十分值得尊重和赞赏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出于自身的呼召与异象,不揣浅陋,希望中国基督教会大力扶持和推进现有的基督教经典翻译。于是,我们提出如下问题:我们的经典翻译是否可以放慢步伐,是否可以不必急于多快好省地赶超自己或某个想象的异邦?是否能够做到宁缺勿烂?我们基督教会是否能够在这个急功近利的世代开创出不同的可能性,耐心地培育专门人才,耐心地建立经典翻译机制和传统,为经典作品的翻译和文化的更新与转型打下可以持续的稳固基础?我们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提出问题,而是更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微小、但切实的努力,建立译场,进行专门研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语言素养,为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并且为中国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做出一点点微薄的努力与贡献。

**English Title:**

# The Translation of Christian Classics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nd Its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QUXutong,**

Th. D. fromHeiderberg University, Lecturer 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Xinjiekouwai Street 19, Haidian, Beijing, 100875 China. Tel: +86-150-1048-2882. Email: thomasquxutong@ yahoo. com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a great change. This is a change that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in the preceding thre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facing a transformation, a "restart" or reset, and has had to adjust itself to the impulse and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ulture that has been coming with the imperialist western nations. In this great change, the Christian church should not forge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mission. It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new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from its own perspective and standpoint. On the basis of the survey of the respectful efforts of translating the Christian classics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this article will follow the exemplary experiences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also of the Japanese church, and will appeal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ristian classics.

**Key terms:**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Translation of Christian Classics, Cultural Responsibility